

重庆市中区工商社团沿革概述

刘 志 诚

重庆是历史古城，地处四川东南部，背靠巴山蜀水，面临滇、黔、湘、鄂诸省，拥有扬子、嘉陵两江、握交通枢纽，扼水陆要冲。历来是西南地区工商贸易集散地，又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市中区居重庆市的中心区域，是重庆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川东的商业重镇和货运中心，重庆工商社团的发展及其活动，主要在市中区地域内。

一、行会 行帮 会馆 公所

工商社团组织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增多，商人与士、农、工列为“四民”之一。到了隋唐，商品生产发展较快，商品种类增多，流通量增大，市场出现了帛市、酒市、药市、菜市等行业。这时，商人的同业组织——行会或帮会开始形成和产生。北宋时期，商人按不同行业组成行会。同时，手工业作坊的行会也开始诞生，有的称“行”，有的称“作”。如金银行、木作、油漆作等。南宋时期，行会组织设有固定办公地址，政府通过行会，对商业、手工业进行管理。清代，手工作坊有了发展，开始出现了工厂，商业日益繁盛。1890年，日英帝国主义列强渗入我国内陆，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冲击了自然经济解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维护同乡同业小集团的利益，各行各业相继

成立了排他性的帮会组织。大多兴建了会馆或药王会、同庆会等组织，以维护本帮同业利益。直到以后重庆成立总商会，始统一各帮成为总商会所属的同业公会。

行会、行帮。是工商业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建立的封建性行业组织。在清代咸丰之前，重庆市中区地域内就有各商人组织的幕会。如粮食商人的“财神会”。1860年以后，又逐步出现有组织的“米粮帮”和棉布帮组织的“骑行会”等。到清朝末期，已有糖、麻、花（棉花）、酒、药、油、烟、干菜等八大行，它们都建立了行帮组织。以药材业为例，帮会组织五花八门，有所谓“药七帮”和“药十三帮”之分。这种行会、行帮组织，既无固定企业，又无经常活动，只是每年举行两次“敬神”仪式，同业间聚集宴会而已。后来，这些组织采行“帮董”或“会首”制。帮董，会首一般由“袍哥大爷”担任，享有很大权力，在帮内也形成了一套共同遵守的陈规陋习。帮会是初具规模的行业同业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对外代表同行与官府联系，办理官府委办事项；对内协调商事纠纷，划分业务范围，召集聚会等。

会馆，晚于帮会。清朝乾隆年代，清政府允许开设会馆，全国各地部份省区沿袭商业开埠设馆的传统，来渝设馆。设在重庆市中区地域内的会馆就有10个之多。如广东籍的南华宫，浙江籍的列圣宫、福建籍的天上宫、湖广籍的禹王宫、江西籍的万寿宫、江南籍的江南馆、陕西籍的三元庙、山西籍的山西馆、云南、贵州籍的云贵公所。这些会馆各自都设有供奉神位。如广东的南华宫供奉“六祖”，浙江的列圣宫供奉“关帝”等等。会馆具有商团性质，大多以省名代表帮口业务。如广东帮代表药材业，会馆设在下半城羊子坝，江西帮代表磁器业，会馆设在储奇门，浙江帮代表银楼业，会馆设在民生路。会馆的主要任务是：协调行业内部关系，排解商事纠纷，管理本省来渝客商，办理会员登

记，维护同业社会权益，承办捐税征收，应付消防、团练和重大债务的清理，孤儿院、敬老院的管理以及其他慈善事业的兴办。对外负责与地方官府的联系。会馆的组织形式与帮会相似，头目称“首事”，选举产生。会员申请入会，必须证明确属有籍贯，原籍已列入某种行业，取得首事同意后，先交纳入会的会费及其他费用，才能取得会员身份，若捐献土地或金钱，使会馆基金扩大者，可取得世袭终身会员资格。会馆的社交活动频繁，有的一年多达数百次，少的也达几十次。一般会员聚集宴会是在“敬神”或其他特定的庆祝活动时才举行。

公所，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具有会员多，业务广的特点，其组织仍是封建性的行会组织。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在1902年前，重庆市中区地域内就聚集着重庆和外地来渝的各行业公所12所。它们是：八省公所（棉花）、买帮公所（棉花）、行帮公所（棉花）、食盐公所（食盐）、同庆公所（棉纱）、纸帮公所（纸张）、酒帮公所（酒类）、糖帮公所（食糖）、绸帮公所（丝货）、书帮公所（图书）、河南公所（杂化）、扣帮公所（纽扣）。其办公地址及活动场地均在重庆市中区。除有三个公所代表棉花一个行业外，其余一个公所代表一个行业。公所的组织与会馆相似，设执事一人，每年改选一次，连选连任。公所的主要作用是：互通信息，联系业务，协调业务上的矛盾，使之联合成为一个大的行业组织。因之聚会也极频繁，不是唱戏，便是聚餐。以这种方式来协调各帮之间的关系，谋求同行业内部与各帮之间的团结，维护其集团利益。其成员大多是民族工商业者，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行业管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重庆总商会的成立及其演变

1903年，清朝政府设立商部，统一管理全国农、牧、工、

商、路矿事宜。商部上奏清廷，陈述“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其由来，实皆得力於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中国要图“振兴商政”，“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矣”。於是拟订《商会简明章程》廿六条，经清廷批准，在全国施行。

《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盛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并明确规定重庆和天津、烟台、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等七个全国重要商埠，“均作为应设总会之处”。据此，重庆开始筹办商会。1904年，重庆商务分局周静庵约同川东道台和巴县知县，“邀集各客帮，飭令公举商董，每帮二人。以便会议商务”。1905年，川东道台贺之彬令各行帮公举“素晓商务，办事稳妥者八人”，会同重庆八省首事，均作为重庆总商会会董。总商会设总理、协理各一人。公推重庆商界号称“西南首富”的重庆最大票号“天顺祥”老板李耀庭（正荣）为总理，陕商杨怡为协理。他们作为重庆工商界代表周旋於官绅之间。同年10月17日开会，订立了《重庆商会章程》十八条，并将负责人名单报川督外商部立案。重庆总商会正式宣告成立。会址在三忠祠（道门口附近），其责任是“保商振商”。总商会设有商事公断处，商会会长和本帮帮董则为主要仲裁者，处理办法决定后，则由知府交巴县知县执行，“商民莫敢违抗”。1912年，重庆废府留县，不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一个商埠名称，重庆总商会实际上是重庆最高的市政、工商、社会管理机构，最高长官则是商务督办。1923年2月，重庆商务督办杨森在重庆总商会内设立市政公所，管理民政。1926年改商埠为督办署，市政公所改为市政厅。1929年2月，商务督办署改为重庆市政府，正式脱离总商会。同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工商团体臻於合法化。随之将

总理改为会长制。1937年，重庆总商会改组为重庆市商会，依法明确了它的性质是人民团体的职业团体，隶属重庆市政府社会局主管。会长制改为委员制，会长改称主席。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市商会执行委员改为理事，监察委员改为监事。理事和监事任期由两年改为四年，每两年改选半数，不得连任。其组织系统和办事机构是：在理事会、监事会合组理、监事会下，设进出口贸易委员会，提倡国货委员会、工业改进委员会、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审议委员会、业规委员会、公断委员会、设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等九个委员会。办事机构是：在理事长下设事务所，其下再设秘书室、总务科、财务科、工商科等一室三科、科室之下又分别设立股。市商会先后创办了《商务日报》、益商职业学校、通惠中学和举办了两次国货展览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改组旧商会、旧工业会，主张工业与商业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1950年4月，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全市工商界代表大会，成立了“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制订了《章程》，明确了在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团结全市工商界，共谋重庆市工商业迅速恢复与发展。同时，具体接收了旧商会、旧工业会和其他工商团体，为筹备正式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作好准备。1952年1月，召开了工商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选举了市工商联第一届执监委员。胡子昂当选为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温少鹤、肖松立、余耀泽（国营代表）当选为副主任委员。王文彬当选为监委召集人。会址设在重庆市中区中大街15号。根据当时市政府的指示，它的中心工作是：在全市工商界中动员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三、重庆工业会及有关社团的成立

1890年重庆开埠前后，工业方面最早出现的仅有火柴、丝纺、棉织、矿业、航运、电灯等行业，为数不多。直到抗战军兴，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沿海一带民营工业内迁四川（主要是重庆），到1943年已达237家，大多从上海一带迁渝，少数是从华中、华北等地迁来。这使重庆有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内迁工厂陆续到达重庆后，因人地两疏，面临困难不少，而国民党政府亦急需迁川工厂迅速恢复生产，以应军需民用。遂由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出面，邀集内迁厂的负责人吴蕴初、庞赞臣、颜耀秋等16人开会筹组“内迁工厂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经两个多月筹备，于1938年4月17日正式成立“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址设在市中区江家巷。

与此同时，由于川外众多工商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相继抵渝，投资建厂或与本地厂商合股兴办者，比比皆是。其中不少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战时军需民用、增加国力息息相关。再由于业务相近或出自经济利益互利互补，协作需要等诸种原因，经当局同意，先后组建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小工厂联合会”等，构成战时陪都重庆最具影响的几大工业团体，它们都具有社团法人资格。其会员同时也是相关同业公会会员。会员中社会名流繁多，团体内部活动频繁。

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工业会法》（全文共10章60条），同时废除《工业公会法》。《工业会法》以“谋工业之改良、发展，增进同业公共利益”为宗旨，规定包括生产研究、改良、发展、保护会员利益，调处劳资、同业间之纠纷，协调推进政府经济政策和参加社会运动等任务。按《工业会法》要求，

重庆市工业协会（原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于1947年11月酝酿筹组，1948年5月28日，召集纺织、机器等27个工业行业理事长开会，组成筹备委员会，7月9日在胜利大厦举行成立大会，有200余家工厂及会员代表40余人参加，宣告“重庆市工业会”正式成立（会址在江家巷）。选出潘仰山、章剑慧、兰文彬、李志亲等25人为理事，汪定符、吴蕴初、黄志董等9人为监事，互推潘仰山为理事长。参加工业会的工业企业有55个业别206户。按不同企业的职工人数和马力大小作为出席代表人数，交纳常年会费之标准。市工业会内部设有调处委员会和调查统计委员会两个委员会。

1948年10月，重庆区各重要工业公会另组“重庆市工会”后，由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主持约集机器、碾米、造纸、电工器材、缫丝、营造、纺织、面粉、煤矿、针织等业代表座谈，随即组成联谊会，推定周荟柏、潘仰山、白念卿等16人为干事，周荟柏、杨亚山为正、副干事长。联谊会根据当时情况、将工业会任务，具体化为向政府陈述目前工业困难，向会员传达政府法令，与各同业公会取得联系，促进公共利益，成为工业会会务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

四、同业公会的形成及其演变

同业公会是工商界历久相沿的组织。辛亥革命后，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法制建设日臻完善。1916年，北洋政府制定了《工商同业公会法规》，1929年8月17日，国民政府根据《民法》精神，正式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自此，各种旧的同业组织相继改成了同业公会，新的同业公会纷纷建立。193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商业同业公会法》、《工业同业公会法》和《输出业同业公会法》，废止了《工商同业公会法》。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要求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各种职业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而共同抗日。于是各种工商团体和同业公会纷纷建立。1939年6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常委会通过了《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规定了企业“强制入会，限制退会”的原则。1940年8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颁布了《非常时期职业团体会员强制入会与限制退会办法》，规定一切工商企业及从业人员必须加入同业公会，非特殊事故不得退会。194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及《国家总动员法》，再次强调了上述“强制入会，限制退会”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省外工厂、企业大举内迁来渝，重庆的工商企业蓬勃发展，从1938年至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各业同业公会所属工商会员企业达27000余家，比抗战前增加了三百多倍。在重庆市中区地域内各业同业公会组织亦迅猛发展，计有125个行业，88个同业公会。它们的办事处所及活动场地均在中区。所有同业公会章程都明确规定了它的名称、宗旨、区域、会址、职员、选举、会员资格及经费等。

综观各行业同业公会根据立法规定的任务，在抗日战争至重庆解放前夕这一阶段，归纳起来，在市中区地域内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活动，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即：一是为政府服务，办理政府委办的各种事项；二是为社会服务，发动工商业者募捐，支持抗日战争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三是为本行业服务，组织货源及市场开拓，兴办各种行业公益事业以及排解与协调同业之间的纷争等。

1952年，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后，经过全面整顿、改组，按工业、商业、饮食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市郊农业等八大类，分别成立同业公会52个，（工业25个，商业18个，饮食业1个、建筑业1个、运输业1个、服务业5个、市

郊农业1个),同业委员会13个(工业5个、商业2个、饮食业1个、运输业2个、服务业2个、金融业1个),并由国营公司派出公方代表75人,担任主、副委员,直接掌握政策,具体推动工作。

同业公会组织结构。各行业同业公会设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至二人,理事、监事各若干人,均选举产生,任期二至三年,连选连任。在正、副理事长之下,一般均设立法规研究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业务计划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依靠各委员会和工作人员推动会务活动。同业公会办事机构,一般设正、副秘书长,协助正、副理事长主持会务,下设调查研究科、组织宣教科和总务科,开展同业公会的会务活动及处理日常工作。

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发展史

曹黎明 整理

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历史悠久，名声遐迩。主要生产经营糖果糕点、粤菜粤点。几十年来它以丰富多样独具特色的风味产品著称于世，以务实创新开拓的精神，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了发展。

一、冠生园的创立及初期发展

冠生园，由我国民族资本家冼冠生先生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立。

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广东佛山人，一八八七年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十五岁到上海“竹生居”霄夜馆当学徒，由于勤奋好学，三年学徒期间在烹饪特别是糕点制作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学徒期满后，冼冠生便以家庭为班底开办霄夜馆，由于地处偏僻，顾客少，缺少本钱，霄夜馆经营惨淡，停停开开达十年之久。屡遭失败后，冼冠生改做摊贩生意，白天他和母亲妻子挤在亭子间住处赶作牛肉干、陈皮梅，晚饭后，他便挑着食品到上海南市区九亩地新舞台戏院门口摆摊。这一时期，他便开始用商标纸。他在报纸上看到香港有个名叫冠生园的食品店歇业，便捡起这块招牌，印制了“香港上海冠生园”的商标纸作包装纸使用。由于九亩地比较热闹，冼冠生的小食品又很有特色，生意渐渐做开，并引起新舞台戏院验票员薛寿龄的注意。薛的父亲是上海著名京剧演员薛小表，家资富有。薛发现冼冠生既有一手好的烹饪

技艺，人又聪明勤奋，便提出合资办店铺。冼欣然同意，于是共同集资三千元，于1915年以“香港上海冠生园”为名的食品店便在上海九亩地开业了。

冠生园成立后，循着一条稳妥谨慎，谋求发展的道路前进。开业之初，仍以冼住家的亭子间为作坊，雇用了几个工人，以生产牛肉干、陈皮梅及各式糕点为主。冼除亲临生产外，还主持业务经营，内外照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业，冠生园开始生意兴隆，出现了发展趋势，原来的合伙经营形式已不能适应。一九一八年，冠生园增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董事会。邹梦梅为董事长，冼冠生任总经理，在斜桥局门路建立了食品工场，生产糖果、糕点和小食品。

二十年代上海食品业竞争激烈。泰丰、泰康饼干驰名国内。冼冠生不从饼干上与之竞争，而是另辟蹊径，以初具规模的糖果糕点为经营重心，将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到粤菜粤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与同业的角逐中，注重产品质量经营特色，敢于推陈出新别出心裁，以独特的产品独特的风味取胜。创业两年，冠生园的牌子便打响了，生产经营蒸蒸日上，出现了冠生园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发展。公司迁到上海最繁华的大英马路（即现在的南京路），租用了一幢五开间的三层楼房，底楼设糖果门市和饮冰室；二楼为粤菜粤点饮食部，还附设了冠真照相部；三楼为雅座。九亩地原址改为冠生园老店，又在上海市内另开设了五个支店，一个发行所。为解决生产落后于销售的矛盾，又在上海西部漕河泾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四层楼房，作为机制食品厂，仍生产糖果、糕点、饼干。斜桥局门路工场改为罐头厂，生产红烧牛肉、凤尾鱼、果子酱、油闷笋。在发展期间，冠生园除了注重产品质量特色，努力树立企业声誉外，更重视对职工们的管理。冼冠生以“本心”、“本领”、“本钱”的三本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本心”即号召全体职工有办好冠生园的事业心和责任

心；“本领”是要求职工努力提高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能力；“本钱”则要求全体职工共同开源节流，积累资金以利企业发展。在普遍采用最低级原始的强制暴力手段强迫工人超负荷劳动以获取最大利润的二、三十年代，洗冠生却采用精神启导方法，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很快，冠生园的糖果糕点和泰康的饼干、梅林的罐头便在上海食品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冠生园在上海奠定基础后，洗冠生便开始筹划企业由南向北发展。他采取先开好一个分店，获得了效益，再筹建另一个分店的方针，1928年在汉口首先办起了第一个冠生园分店，接着又陆续在武昌、庐山、杭州、天津、南京开设分店。在上海增辟了漕河泾农场，既供人游览，又向游人介绍冠生园的特色产品。在杭州超山购置了梅林，种植原料。在西湖备有画舫。

从1915年到1935年，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创业和苦心经营，冠生园从一个食品摊跻身为中国食品行业产销结合，工商一体，风味独特，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大型著名食品企业。

二、重庆冠生园的创立及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上海陷落，冠生园漕河泾工厂被日军占领，各地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退至汉口，迁到重庆。洗冠生的注意力也转向西南，决定以重庆为中心，在西南大后方重新打开经营局面。

1938年夏天，洗亲赴重庆，选择店址，经过奔走考察，在最热闹的都邮街（即现在解放碑）选定了店址。1938年9月30日，重庆冠生园正式开业。

重庆冠生园成立后，仍以经营各类糖果，新式糕点和粤菜粤点为主，继承发扬了冠生园的优良传统，对产品强调真工实料，讲究质量，注重特色，敢于创新，服务上提倡一切为顾客着想。另外，还根据当时企业面临的多阶层消费市场，制定了适应多层

次消费购买力的产品结构，如饮食部粤式菜点的供应就分高、中、低档三类。那时，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已经迅速发展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人口骤增，内迁工厂剧增，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费需求迅速膨胀，冠生园抓住这一大好机会，利用自己几十年的经营经验和培养的一大批技术人才、业务骨干，很快便以压倒优势驰名于山城市场，不仅门市生意好，餐厅也座无虚席。不久，冠生园便在关庙街开设了第二支店，在道门口设立第三支店，在太平门建立第四支店，在游览区南温泉设立支店、招待所、面包车间，连同设在来龙巷的食品厂和赖江街食品分厂，重庆冠生园的店、厂职工共计四百多人，成为重庆冠生园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重庆冠生园还为西南各大中城市冠生园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金，人员及设备。1939年起，以重庆为中心，相继建成了昆明分店，贵阳分店和泸州分店等。

抗战胜利后，重庆冠生园先后向上海冠生园总公司汇出法币一亿多元，美金外汇二万零伍佰余元，黄金一百余两，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和各店厂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后，达官贵人纷纷撤走，冠生园业务状况随之下降。1948年，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通货恶性膨胀。奸商囤积居奇。重庆冠生园生意清淡，处境艰难，每况愈下。1949年的“九二”火灾又使其遭到严重损失，为维持局面，重庆冠生园缩减职工二百多名，至解放前夕，重庆冠生园仅剩下一百余人，勉强支撑，濒临破产。

三、解放后重庆冠生园的变迁与发展

1952年重庆冠生园成立劳工工会，并随即成立了劳资协商会，1954年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前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上国家的扶持和一批退出而又长期在生产实践中受过严格训练的老职工的返

回，职工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重庆冠生园又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各门市餐厅生意兴旺，日常供应品种丰富多采。一到节日，更是繁忙，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如春节的汤圆心子，端阳的广式粽子，泥包盐蛋，松花皮蛋，中秋的广式月饼，正月的猪油年糕，桂花年糕，腊月的关刀肉，金银肝，五香肚，各式香肠，产品一上市就销售一空。1955年，仅来龙巷食品厂的年产量就由原来的五百吨猛升至五千吨。

之后，重庆冠生园又历经了体制的变迁。冠生园原为工商紧密结合体，生产门类齐全，既有自己的罐头厂，又有糖果糕点食品厂。1956年，重庆冠生园罐头厂被划出，与国营重庆罐头厂合并。1961年，重庆冠生园食品厂与重庆冠生园商店分为两个独立核算单位，两家同属市糕点公司，共同使用原“冠生”商标。1966年，文革期间，冠生园招牌被砸烂，改名重庆东风糖果商店。1970年，冠生园商店（即改名的东风糖果商店）划归市中区蔬菜副食品公司，冠生园食品厂仍归市糕点公司。

1979年1月，重庆东风糖果商店被列为全省四十个扩权单位之一，正式复名为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重新使用“冠生”商标。

在恢复“冠生园”名称的同时，公司开始整顿店容店貌，着手恢复传统经营特色，仅一年就恢复新花色品种130个（包括糕点、粤式菜品、腌制品和小食品），1982年冠生园邀请广州饮食服务公司和曾赴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主厨名师，来冠生园献艺和传授技艺，举办粤菜、粤点精品汇展。之后，每年举行一至二次，直至1986年主楼拆迁为止，前来参观的顾客达一万八千人次。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于1984年在大坪以租赁形式迁了新的食品厂，购进新设备实现了产品半机械化。公司下设第一营业部，第二营业部（含招待所），饮食部，

食品厂，经营部五大部门，生产经营优质上等糖果，中西名特糕点，各类罐头瓶酒，蜜饯腊制品，奶乳饮食品，广式粤菜粤点等二十个类别，上千个品种，产品誉满山城，驰名国内。1985年至1986年，公司有四个产品分别荣获中商部优质产品奖，十一个产品获省市优质产品奖，十个产品被列入重庆市名特风味食品。

在“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重庆冠生园于1982年倡导并主持召开了全国各地冠生园首届经验交流座谈会，成立了跨省市同字号企业联谊组织——全国冠生园联合会。各地冠生园的生产工艺，经营特色，业务技术，经济信息，产品开发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与发展。

现在，重庆冠生园已发展成一个生产基地牢，名优产品多，销售地区宽的名声遐迩的综合性食品企业。

附：历届重庆冠生园食品公司负责人名单

姓 名	职务	任职年限
徐佩榕	经理	1938—1945
程道生	经理	1945—1956
刘序德	经理	1956—1958
杨淑芳	党支部书记	1958—1963
郑永宾	党支部书记	1963—1967
朱寿宜	书记	1968—1979
龙弟芳	书记	1979—1981
谢大胜	经理兼书记	1979—1992

猪鬃大王古耕虞

杨耀健

—

太阳西沉，落日的余辉洒满黄浦江，倒映在教堂幽暗的过道里，晃得那些泥塑木雕的先圣们忽明忽暗。教堂大门洞开着，两堵弧面墙架着许多拱顶，将人们的目光导向门廊深处，犹如临渊窥底一般。

带潮的河风，从铁窗棂里钻进来，时而吹动着牧师的白发，时而撩起供桌上的台布，时而掀动着福音书的书页。好些身影跪在罪凳上，隐没在袅袅香烟之中，就象一些凝固的偶人，模糊不清地诵读着圣诗。

人群中有一位14岁的四川少年，虔诚地划着十字，默念着基督耶稣的仁慈。他的名字叫做古耕虞，刚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预科，目的是专攻英文。

1919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为了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国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年少的古耕虞追随大流，跑到商会大门口高呼爱国反日的口号，结果被其族叔祖、重庆总商会会长古绥之送往上海，交其父古槐青严加管束。

教会学校实行西式教育，这使古耕虞能接触到许多新鲜的外来思潮。四年预科毕业时，他的品学皆优，功课和体格都好，还取得了圣约翰同学会的会籍。这对于他以后进入上流社会影响甚大，因为那时依附于美国势力的高等华人，有不少出身于圣约翰系统。

古槐青一度想把儿子培养成纺织工业技术人才，于是古耕虞

接着进了南通学院纺织专科。但他有色盲，不适合搞纺织，只读了两年，未等毕业就回到故乡重庆，继承他父亲的事业。

生活已经在古耕虞的学生时代后面加了一个句点，现在又在他的成人时代前面划下了一个问号。他突然感到惶惑，担心自己的肩头还过于稚嫩，他开始大量读书，用以充实自己。

他读《圣经》，也读《富兰克林传》。

有天晚上，他先看一本流行小说，觉得没意思，又换了一本，从后向前翻着看。

深夜，家人都入睡了，只有他的灯还在黑暗中亮着。那本书把他迷住了，他翻到封面，看到了书名：《福特管理》。为什么他以前没听说过这本书呢？

此后几天，古耕虞又把这本书细看了一遍。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确是在不动声色地宣布：实行企业经营管理大有好处。

《福特管理》最强调的两点，一是要建立行业垄断组织；二是要建立生产流水作业线，使每名工人都不能闲着。

时代前进了，光凭老祖宗那一套玩不灵。既要参加竞争，就要使用新的绝招。洋人写的书有道理。以后，他又把这些方法中国化了。

二

1925年，古槐青在重庆开设了“古青记”鬃山货字号，向上海洋行出口猪鬃，自选的商标是只红色的老虎，叫“虎牌”。少东家古耕虞，那年刚满20岁。

在外行人看来，猪鬃不过是些脏乎乎的猪毛，物轻价贱。岂不知猪鬃制成的刷子不易卷曲缠绕，油漆时挥洒自如，并且能耐高温，和平时期建筑业最需要它。到了战争时期，从油漆卡车、飞机、军舰，到清刷大炮的炮筒，海陆空军都离不得它。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把它列为A类战略物资，猪鬃的出口利润大